



谦谨为学 厚德育人

——访清华大学党委原书记贺美英

○ 麻敏华 肖小强等

一个温暖的春日午后，我们一行5人来到了工字厅，这里春意浓浓。校长办公室的王老师把我们带进了庭院深处的东甲一，贺美英老师微笑着走上前来迎接我们。想着即将到来的访谈，我们心里既紧张又好奇。

头一次和贺老师零距离接触，我们有点不知所措。贺老师先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大学生活，她慈祥的眼神和爽朗的笑声，让我们紧绷的心也放松下来，随着她细细去感受那段久远的历史。

贺老师1956年进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，1958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59年暑假后半脱产担任学生政治辅导员。1963年毕业服从分配留校工作。贺老师经历了1958年的“大跃进”，在她平静的话语里，我们仍能感受到那个年代的狂热和激情。为了响应国家“大炼钢铁”的号召，电机系要生产28千瓦鼠笼电机，所有的设备都是学生自己动手完成；在北门外的土电厂，高年级学生生产高压油开关，本着节约、简单、易用的原则，用豆油做绝缘油，用乒乓球做浮漂，周总理视察时称赞道：“聪明！”机械、电机两系联合生产程控机床，电机系负责专用计算机和控制电路，完全用分离元件晶体管搭建繁复的电路。贺老师对那段学习做了客观的评价：通过劳动，对书本上的某些原理了解得更透彻，有利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，提高了动手能力，发挥了青年人的创造性和聪明才智，但是有些走极端，劳动过多，造成知识不全面、不系统、不牢靠，所以1960年后又全面补课，“填平补齐”。

谈到当辅导员对个人成长的积极因素，贺老



贺美英

1956~1963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电机系，1959年起担任学生政治辅导员，毕业后留校工作。曾任清华大学校团委副书记，自动化系党委副书记、书记，校党委常委。1986年7月任校党委副书记，1988年兼任副校长。1993年兼任校工会主席及校党委组织部长。1995年9月任校党委书记、校务委员会主任。1993年当选中共北京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。1997年当选为中共十五大代表，并当选为中纪委委员。2003年当选十届政协委员。

师认为，当辅导员对人成长的意义很大，对人的锻炼很全面。贺老师的辅导员工作经历十分丰富，早在学生时代的1959~1961年，年轻的贺老师就担任了学生辅导员。1963年后，作为教师的贺老师又半脱产当辅导员，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。

贺老师说，多年辛苦的经历首先“训练了一种责任感，知道了做一件事情不容易。‘责任心不是讲出来的’，要努力做好每一件事情，做不好的话，对不起同学们。”1964年冬天，根据蒋南翔校长意见，清华加强了对高干子女的教育，让他们了解工农群众的生活。贺老师



负责带领一批高干子弟去上庄劳动，又要教育他们，又绝对不能出问题，这期间担负的责任是很大的。由于当地农民用地炉，防煤气的措施很差，有一个屋的同学轻度煤气中毒，幸亏及时发现，没有出大问题。这次经历让贺老师头一次体会到了责任压肩的紧张。

其次是坚定了自己的政治信念，锻炼了群众工作的能力。不能发动群众，就无法进行工作。有的同学学习优秀，却不关心政治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；有的同学思想不够上进，有各种观点，作为辅导员就要引导他们向好的方向发展。为了能启发他们，首先逼着自己去读书学习，丰富自己的头脑，使自己有正确的立场、观点，坚定的政治理想。要“磨利”自己的舌头，讲出让人信服的道理。就这样，既提高了自己的理论水平，又锻炼了语言表达能力。

贺老师在当学生辅导员时，曾经负责比她高一届学生的毕业分配。毕业生们填写自己的意向，学校做完分配方案后，交上级审批，两周后公布结果。就在一切准备就绪、通知毕业班开会时，审批的毕业分配表却无法拿到，最终公平分配结果的会议不得不延期。虽然并不

是贺老师的错，还是受到了领导的批评。吃一堑长一智，就此知道了搞一个活动需要考虑很多意想不到的因素，做一件事情之前，要考虑得周到细致，才不至于被意外情况搞得焦头烂额。

当时受“左”的思潮的影响，学生中间大搞学术批判，批权威，批维纳的控制论，批麦克斯韦

方程组，觉得这样很进步。蒋南翔校长却皱着眉头说：“后人都是在前人的肩膀上进步的，这样不好。”林彪号召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语录，说毛主席的话“一句顶一万句”，蒋南翔校长则鼓励大家“学原著，学习立场、观点、方法，而不是只言片语。语录不是符咒，不是万能的。”听从了蒋南翔校长高瞻远瞩的意见，贺老师从中学会了要怎样掌握政策，提高了自己分辨和认识是非的能力。

辅导员要“双肩挑”，学校只是减轻了教师的部分教学任务，而不是全部减免业务工作，做辅导员工作并不能成为耽误教学工作的借口。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，辅导员要做到“双肩挑”，辅导员工作要做好，业务更不能落下，就是只讲一门课也要讲好。这样在无形中要求辅导员要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。有人说当辅导员是一种压力、一种牺牲，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培养、一个机会。不同的经历造就了不同的人才。

当我们问到当年的青年人和现在的青年人有什么不同时，贺老师想了想，答道：“无论时代怎么变，青年人的共性——热情，有理想，有抱负，希望有所作为是不变的。那个年代，

社会封闭，政治气氛强烈，人们一心奉献，毕业后服从分配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，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。支援偏远的青海、新疆、东北，从基层干起，脚踏实地一步步做起，人们心态平和。”

“而现在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利益原则的指引下，同学们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发展，双向选择机会更多，人们的心不再拘泥于一个小空间，这样的变化都是可以想象和理解的。清华大学的学生大多是来自各校的佼佼者，独立好强。有些同学孤傲，只能做一个人的工作，欠缺领导人所必备的组织能力和与人沟通合作的能力，那是不能成就大器的。有些同学因不再出色而自卑、封闭、消极，这样对个人的发展肯定是不利的。第一名只有一个，就算是当配角也要做好，要尽全力！”

援引蒋南翔校长的话，“青年人做社会工作是有大出息的负担”，贺老师希望同学们能多担任一些社会工作锻炼自己：“学校希望能给每个人这样的机会，可是毕竟当辅导员的只是少数人，通过其他社会工作同样可以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。做学生工作要本着两个原则：一要看是否符合实际，二要看是否对大多数人有帮助。社会工作中，免不了有不被人理解的地方，在这个时候能否受得了委屈，能否平衡自己的心态，就显得很重要了。‘薄脆’的人一击就倒，难以在社会上立足；‘皮实’点的，就容易生存。遇到挫折，往好的方面想想，权当是交学费，大不了从头再来。许多国家领导人在基层都经历了很多摔摔打打，如果承受能力不强，再也站不起来，哪有他们现在的成功？清华只是给大家一个良好的基础和起步，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。磨练也是一种锻炼，这种锻炼也许能给予你更多。”

说到当辅导员感受最深刻的事情，贺老师又想起很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。

带学生去上庄劳动的时候，贺老师和两个女同学住在农民李大哥家里。李大哥和大嫂其实也就40岁吧，但是常年的操劳使得他们过早地衰老了，开始竟被误当作老大爷、老大娘。

看到大嫂蹲在地炉旁煮地瓜秧的粥，吃着这样难以下咽的饭，才知道原来农民的生活是这么的艰苦。贺老师深受触动：“你有什么理由上了大学就高高在上、养尊处优？有什么理由不为劳苦大众服务呢？”老师话语中那发自肺腑的真切情感，让我们的内心也深深感动。
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时，许多学校领导人被诬蔑为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”，贺老师也被诬蔑为“黑帮”分子，被拉出去批斗游街，让老师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最先批斗自己的竟是自己负责的班上的团支部书记！贺老师也曾经迷茫过，苦闷过，怀疑过，究竟谁对谁错？是不是自己真的做错了？但是当她看到、听到学校里老一辈革命家们不畏武力，坚持自己的理念，尤其是蒋南翔校长的坚强态度，坚持真理的精神，最终自己的精神也坚强起来，熬过了那段艰苦的日子。这段让贺老师难忘的痛苦经历，给予她的是另一种精神上的宝贵财富。她平静地说：“这段经历让我坚强。我不会违心地讲假话，在某阵风来的时候，我可以坚持自己的立场。‘文化大革命’那么艰难的日子都挺过来了，还有什么困难可怕？还有什么困难不可以被征服呢？”

谈到评价学生的标准，贺老师认为，现在评价学生越来越量化、细化，功课分量太重。但是目前还没有更好的可以替代的评价体系，所以希望同学们自己放开一点，不要把这些看得很重，走自己的路。不要随风而动，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，根据自己的特点、有重点地来发展自己，明白自己的所需。

时间在我们愉快的谈话中悄悄溜走了，当我们起身告别时，面对和蔼可亲的贺老师，看着贺老师发白的双鬓，慈爱的眼角，竟是那么的不舍！短短两个小时的谈话，让我们对贺美英老师的了解加深很多，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她的坚强，她的真实，她的执著，她的实事求是，她的平易近人，她的殷殷期盼……静静地走出工字厅，回头看厅里那株含苞微放的白玉兰，映着暖暖的落日余晖，更显素雅高洁。

